◆观 点

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新型智库

智库作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新形势下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需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列重要讲话，明确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科学内涵。

对此，需从三个角度进行理解：第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制度化的重要标志。第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智库发展在其国家治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我国智库现状难以满足提高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求，智库发展还相对滞后：一是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缺乏制度性保障，也未能得到系统性体现。二是智库对决策的影响多处于若即若离状态，在党和国家科学、民主决策体系中缺乏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安排。三是我国智库多以官方、半官方为主，智库本身难以平衡体制属性与政策研究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四是智库研究成果向决策咨询、社会效益转化的渠道不够畅通，效率有待提高。五是我国智库总体而言战略谋划和综合研判能力不足，政策研究质量和水平有待提高，尚不适应新时期决策的需要。六是党政机构与社会对智库建设的重视程度有待提高，智库发展还面临很多体制性障碍。

智库在实现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要发挥重要作用，包括四个方面：资政辅政，启迪民智，平衡分歧，聚贤荐才。同时，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智库不但需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理论总结，为进一步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理论自信的依据；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对占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实现现代化所面临的独特国家治理问题进行系统性、前瞻性研究，为党中央和国务院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决策提供支持。（2014年10月8日《经济参考报》金辉）

地方政府债券风险不能忽视

近日国务院以国发〔2014〕43号文形式，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如果这一文件得到切实推行，必将成为当代财政史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改革事件。《意见》的主题是地方政府债务，着眼点是地方性国债，即地方政府债券。《意见》标志着地方政府债券的发放从试点阶段进入到全面推行阶段。不过，当从中长期角度去看地方政府债券问题时，相应的风险机制也应该多作设想。当然，《意见》本身已经对风险机制进行了一系列规范，可见有了充分考虑，不过，我在这里仍然要提供一些《意见》外的意见供参考。

政府债券的风险主要在发放与偿还两个环节。在发放环节，可能发生《意见》约束之外的两种现象：一是以某种政治、道德的口号出现。梁启超曾严厉批评将“爱国”与购买国债结合的热情，指出国债是纯粹经济行为，跟爱国不爱国并无关系，不可以将买卖国债视为爱国行为，这种行为本身不过是出于解决财政需求和投资盈利的目的。这方面清末时教训极其惨痛，比如保路运动的根源之一即在这里。特别喜欢提政治、道德口号的今人如果在这方面不谨慎，很容易重复历史错误。二是地方政府债券很容易通过强制手段令当地民众购买，有摊派恶习的时代在这个问题上尤其必须严厉预防。

在偿还环节需要研究的问题更多，这也是《意见》风险防范的重点。但是，仍然需要进行一些深入的思考。《意见》所说的“地方政府”没有明晰的范畴约定，显然不限于直辖市、省、自治区一级，但是否低至县（市）乃至乡（镇）？《意见》第四条第二款明确“中央政府实行不救助原则”，也即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券不承担最终偿付责任，那么，直辖市、省、自治区政府是否为所属政区下属政府的最终偿付人？也即，当一个县（市）政府无法偿付债券时，债券持有人是否可以要求其上级市（地）政府乃至直辖市、省、自治区政府履行偿付责任？如果可以，那么，当连直辖市、省、自治区政府也无法偿付时，债券持有人相应的债权该如何落实？

这当中又涉及两个严重的障碍：一是当无法偿付债务时，地方政府是否可以实行破产？二是政府资产比如公用事业是否可以企业化乃至私有化？这是两个互相连带的问题。政府可以破产则债券持有人应该可以对政府资产进行清产核资，政府不可以破产则债券持有人如何在政府资产中体现出权利？比如某个地方政府当无法偿付债券时，如果该地方政府破产则自然就不再成为其资产的所有人，所有人地位可以由债券持有人取代；如果该地方政府不能破产，则其作为资产所有人地位不变，虽然资产可能被判决赔偿债券持有人，但当资产既不能企业化又不能私有化时，该部分资产的运行就仍然只能由该政府支配，债券持有人并不能实质性获取资产支配权。当然，这些可以通过进一步的改革解决，但进一步的改革能否实行则属于另一个层面的问题。（2014年10月6日《南方都市报》顾则徐）

◆纵 横

诺贝尔奖为何青睐“大脑GPS”

尽管人们外出旅行和探险会有时迷路，但大多数人除了靠指南针的帮助外，都会依靠一种本能来辨别方向而不迷失，这就是我们大脑中的“全球定位系统”——GPS。现在，揭示了人脑中GPS的三位研究人员获得了2014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们分别是，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授约翰·奥基夫、挪威科技大学教授梅·布里特·莫泽及其丈夫爱德华·莫泽。

揭示大脑中GPS的奥秘既不能让人发财，也与医生治病和研发药物无关，却能受到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青睐，原因何在？

其实，这是诺贝尔奖评审一以贯之的特点和风格之一，注重基础研究和发现，揭示人类和自然的奥秘。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显然，人类大脑中GPS的发现并不能通过医学的手段，如移植一些定位细胞到“路盲”的大脑中以帮助其不迷路，但是，肯定这一研究揭示出的是一种人类亘古以来所追求的一个哲学命题：认识你自己。而在人类的认知中，认识你自己最难。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并非第一次奖励这种看似“无用”的知识，历史上另一个“无用”的知识受到诺贝尔奖的青睐是1973年，奖励的是基本与生理学或医学无关的领域。康拉德·柴卡里阿斯·洛伦兹、K·弗里希和N·廷伯根三人，因其揭示了动物本能的固定行为模式和动物学习的“铭记”等概念而获奖。

通俗地讲，如果一只灰雁或鸭子生下来就与洛伦兹或一条狗在一起，它就会把后者当做其母亲而不离不弃，始终跟随，这就是“铭记”。这个发现与医学无关，也不是让人类“认识你自己”，而是让人类认识动物并了解动物的心理——这“有用”吗？其实，从长远的观点看是有用的。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动物、环境和生态，人类能活得更自如和更舒适吗？

今天的人脑GPS成果获奖是人类“认识你自己”的经典之作，大脑中GPS细胞的发现让人类更多地认识了自我。这对于科研或许也是一种启示，别以过于现实的“有用”与否限制自己的视野。（2014年10月7日《新京报》张田勘）

◆史海钩沉

平民化 世俗化 人文化

北宋所承继的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分裂程度最彻底的时代之一：中原有前后相继的五个王朝，周边先后分布着十个割据政权。北宋结束了这种动乱频仍的分裂局面。宋朝统一后的疆域远远无法与汉唐相比，但其统治所达到的纵深层面，则是前朝所难于比拟的。

我们的教科书上常说宋代是个“积贫积弱”的时期。“贫”指国力、财政贫乏困窘；“弱”指在对外军事竞争中力量薄弱。应该说，这种概括有一定道理，亦有其片面性。宋代确实是周边受到严重挤压、内政因循求稳的时期，是面临各类严峻挑战的时期，整体战略格局与政策应对有诸多问题；但与此同时，它也是治国基调比较开明的时期，是社会经济、制度建设、科技文化领先于世界的时期，其多方面的杰出成就，有效地牵动了中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

在宋代，传统农业达于成熟，工商业亦有长足发展。有学者研究指出，北宋中期的铁产量在7.5万吨到15万吨之间，相当于1640年英国铁产量的2.5倍到5倍，可以和18世纪初整个欧洲的铁产量相媲美。盛唐天宝年间一年铸钱大约32万贯，到宋神宗时期已经多达500万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正是在北宋出现的。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是在应用科学方面，还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被马克思称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其关键改进期、应用普及期及向外传播期也都是在宋代。

立纪纲、召和气相辅而行

五代8姓14君，一共只维持了53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当时人觉得这无非是短命的第六代而已。但是这个王朝稳定了下来，法宝就是“防弊之政”，其核心精神是防微杜渐。宋太宗将谨守的法度概括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所有事情都要预先做出防范，委曲周全地进行制约。

为了建立稳定的政治文化秩序，宋代以“立纪纲”“召和气”相辅而行。“纪纲（纲纪）”指法规制度；“和气”指的是能够感召阴阳，使天地间充盈雍睦和谐的自然之气。以科举制度为例，制度的严密化，使其更为开放合理。唐代的考生，考前常把作品送给达官贵人乃至主考官员去看，得到推荐、受到赏识的考生有更多被录取的机会。宋代科举考试发展出弥封（糊名）、誊录等技术办法，使得主考官员即使有心照顾，也难以操作。元祐三年苏轼任主考官，门生李廌参加科举考试，大家都觉得是天赐良机。但到拆号张榜时，李廌却榜上无名。

欧阳修称宋代的科举制度“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居官者得不到世代相承的保障；而缺乏家世背景的平民，若能脱颖而出，则得以进入仕途。范仲淹断齑画粥，坚持学业。欧阳修幼年丧父，买不起纸笔，拿芦苇秆在地上画着学字。

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虽然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儒学的传承者作为一个群体在政事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是直到北宋才产生的现象，被称为“士大夫政治”。

范仲淹认为，像寇准这样，在宋辽交涉中勇于担当，一切为天下、国家、社稷考虑，而非唯唯诺诺听命于皇帝，即是“大忠”。南宋的普通官员方庭实，也敢于对皇帝指出：“天下”者，是中国的天下，群臣、万姓、三军的天下，而不是皇帝个人的天下。对于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他们很多人既是政治家，也是经学家、文学家、实干家。他们的追求，被概括为“内圣外王”：内心要达到圣贤的道德修养境界，在天下社会建设一种王道的秩序。当时的士大夫“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正像陈寅恪先生所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自由的时期之一。

宋神宗倚重王安石推行新法。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精神强力推进。朝堂之上他坚持主见，往往辞色俱厉，而皇帝竟也改容欣纳。王安石的卓绝品行和高深文学造诣，受到同时代人的尊重。苏轼在西太一宫看到王安石题壁六言诗：“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不禁“注目久之”，感叹：“此老野狐精也。”

钱穆在《国史大纲》里讲到，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负，相继失败了；但是他们为人为学的精神与意气，一直影响到最近期的中国。确实如此。1972年，毛泽东主席接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曾经提到王安石的“三不足”；2008年，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也表示要效法“三不足”的改革精神。

“贱不必不贵，贫不必不富”

如果把宋代放到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经历着逐渐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社会变迁过程。

自古认为务农才是“本”，宋人却提出士农工商皆本业。宋代没有国家分配土地的制度，官府热衷于审核交易契约，而不限制土地买卖。财富流转迅速频繁，“贱不必不贵，贫不必不富”。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说，在上层精英和民众集团之间，出现了一个非常活跃的阶层，就是商人。他们不仅促进都市商业的繁荣，还使商业的触角延伸到了农村。

在宋代，人们的家世身份背景趋于淡化，科举取士“不问阀阅”，官学生员也突破了严格的身份界限。书院提倡相对独立的教育理念、学术思想和人生价值。文化普及向民间渗透，科举落第者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即便是艰难谋生的下层百姓，也力争每日积攒一二文钱，让子孙将来有机会入学。蒙学不仅教儿童识字，更把儒家的理念、价值观变成现实的社会规范，传达到百姓中去。

从唐到宋，都市景观变化明显。唐代长安城坊市格局井然，尊卑秩序呈现鲜明。宋代开封、临安却展现出一种开放式的街市状态，官府、民户、商家混杂毗邻。城市居民“坊郭户”第一次被列入国家法定的户籍管理分类。大都市海纳百川，城内有各类宗教活动场所，群众喜闻乐见的市井文化，在瓦舍、勾栏、街市通衢中热闹缤纷。

宋代处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型期，它面临着来自内部与周边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并非国势强劲的时期；但它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独到建树，它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使其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就朝廷上的政治生态及制度渊源而言，很难说元、明、清数朝直接承继宋代；但从近代的“人心”“政俗”来看，无论是政治理念、思想文化方面的创新或是因循，宋代带来的影响，都深深地渗透在中国社会的肌体之中。（2014年9月29日《北京日报》邓小南）

融合●创新●发展

2014(首届)中国智慧城市发展高层论坛

即将召开

主办：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电话：010-62805980 62860129(传真) 13311159599 18911285165

Email：cscdf2014@126.com

联系人：杨先生

◆评 论

认识自己和世界到底有多难

中国人认识自己的国家并读懂世界，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中共早在革命时期就不断强调判断时局的重要性，但这方面的错误却时有发生，而且不止一次造成灾难性后果。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时谨慎小心，但不久出现不切实际的“大跃进”，提出“超英赶美”。即使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也不够科学。

“大跃进”出现，毛泽东的认识和决策错误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毛泽东是位思想巨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这一条就足以把他推到时代思想者的最前列。但毛泽东也有看错的时候，这向我们展示了认识局限的真实风险有多大。

今天回望，“大跃进”冒着十足的傻气，如今的一个小青年，就能把那个时代的错误分析得头头是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的思想能力已经足以应付我们自己的时代，一个简单的测试题是：我们今天的困惑比过去更少了吗？

看看如今社会上有多少争论吧，很多都跟国家的政治道路有关。回首过去，我们一目了然。但是看未来呢？我们是否会经常感到在一些不确定性面前思想的乏力呢？

一个人的思想能力既来自他的聪慧程度，也来源于他的见识和经验。对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其历史经验的积累是决定性的。

中国的历史很长，但现代化的经历很短。这一长一短相互碰撞，很容易造成认识论坐标的混乱。

新中国是一个挺成功的国家吗？按说这是一个挺简单的问题，参照体系客观摆在那里，但回答却五花八门，而且知识越高的阶层，回答越尖锐对立。

民主的问题长期困扰中国知识界，而且这样的思想局面恐怕会持续很长时间。要说服那些只愿意把中国同西方社会做对比的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说到底，认识更多不是靠“学”出来的，而是摸索出来、摔打出来、干出来的。新中国经历了贫穷、大饥荒、“文革”动荡，后来又有了改革开放的转折，以及与苏东国家分道扬镳、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多重教训和经验。这一切是我们新政治认识的基础。

然而认识的困局并未彻底突破，西方的很多优势仍在挑战我们的判断力，中国至今有一些人坚信西方教科书上的整套概念，由于他们对舆论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他们是中国道路自信真实面貌的一个元素。

中国越往前走，我们在全球现代化体系中的位置越高，我们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能力也就更强。但客观说，只有中国发展走到人类现代化最前列位置上的时候，中国内部的道路之争才会彻底终结，我们也才有能力引导世界大部分地区政治认识的方向。

不能不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传统政治认识构架被外来元素冲得七零八落，但这些年民间围绕中国该怎么走的政治认同逐渐成型，支持中国走自己路的人越来越多，这个进程因为中国不断取得成就而愈发稳固。

中国出现了多元化的很多新现象，它们意味着什么，带来新思考。中国的持续发展为认识这些问题给予了时间和空间上的保障，今天的中国人面对新的不确定性时未必较前人聪明了很多。我们的优势是，今天的认识过程可以从容些。

最后我们要说，个人认识是形形色色的，社会的总体认识能力，只有国家的真实命运才能记录它的轨迹。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都很难，祝愿中国获高分。（2014年9月24日《环球时报》社评）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政编码：100091 总编辑：钟国兴 社长：王金龙 广告部电话：62805980 62806380 发行部电话：62806227兼传真 总编室电话：62805368 62806234 电子信箱：xuexishibao@126.com
定价：全年180元 邮发代号：1—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261300045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